

湖北文史資料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史料專輯



一九八七年第四輯（總第二十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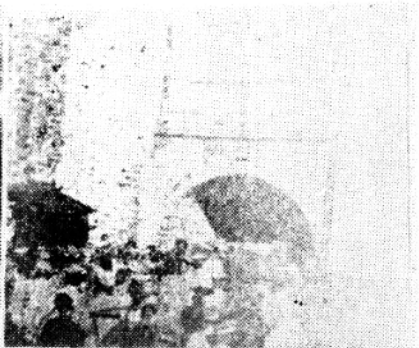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yt184/20



1927年3月12日至17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图为出席此次全会的委员合影。前排坐着，右起（1）吴玉章，（2）甘乃光，（3）陈友仁，（4）宋子文，（5）宋庆龄，（6）孙科，（7）覃延国，（8）徐谦，（9）董必武；后排，右起（1）彭泽民，（2）林祖涵，（3）毛泽东，（4）邓演达，（5）陈公博，（6）詹大悲，（7）夏曦，（8）许伯昊，（9）翟秋白，（10）苏兆征。（武汉市博物馆提供）



上左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昌攻城司令邓演达和俄籍顾问铁罗尼在前线督战。

右上是攻下武昌城后，人民群众通过城门的拥挤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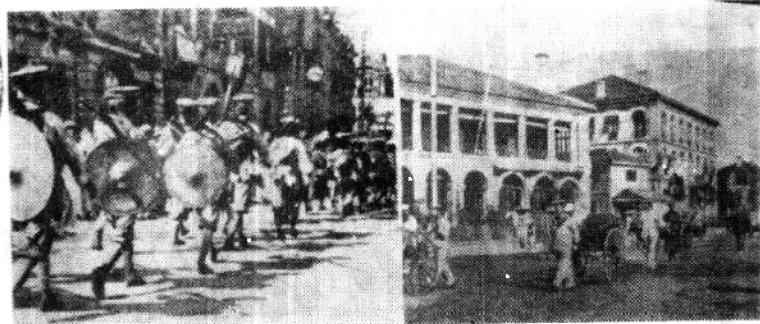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不久，即在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今解放路武汉音乐学院）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图为该校开学时的彩楼大门。次年2月该校又在武昌南湖成立了女生队。图左是女生队西征归来的一则新闻报导。

（图片系武汉市博物馆提供）

武汉工人队伍于1927年1月1—3日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盛大庆祝活动。3日上午,两名宣传队员在江汉关台阶上,面对英租界,向中国同胞进行宣传时,遭到英国水兵镇压,枪伤我群众数人,激起武汉全体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极大愤慨;当即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一致要求“收回英租界!”经过武汉国民政府严正交涉,终于将英租界收回。图右是收回前英国水兵的得意神情,左为国民革命军开进“租界”接管。

(湖北省博物馆提供)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宋庆龄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当时的汪精卫



(上图均为武汉市博物馆提供)

目 录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武汉·····	邓初民 (1)
我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一段经历·····	侯连瀛 (6)
一九二七年的片断回忆·····	韩 璇 (13)
大革命武汉见闻实录·····	王新吾 (18)
唐生智北伐时期二三事·····	周荃青 (24)
跟随贺龙北伐·····	张应祥 (26)
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经理处回顾·····	路之炳 (39)
一九二七年汉口钱庄经营纪略·····	何瑞保 (45)
关于汉口《民国日报》的一些情况·····	沈雁冰 (48)
我所知道的汉口《民国日报》·····	汪原放 (50)
回忆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	张福康 (52)
李之龙筹备蛇山公园的往事·····	李之骥 (55)
汉口首次邮工运动·····	涂善夫 李善夫 (57)
收回汉口英租界见闻·····	王洁之 甘助予 李奉之 (60)
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纪实·····	饶秉凡 (71)
阳新惨案九烈士·····	万兰荪 游寿松 秦章甫 (74)
麻城惨案的前前后后·····	白开基 (88)
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	戴克敏 (93)
忆通山县的大革命·····	朱 明 (97)
大革命风暴中的宜都·····	王子现 (105)

大革命时期的浠水…………… 邓 谷 (115)

烽火中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汤石僧 (123)

军校女兵生活散记…………… 吕儒贞 (135)

记中央独立师平夏、杨之乱…………… 蓝香山 (148)

四川军阀进攻武汉的丑剧…………… 雷云仙 (155)

仙桃镇战役侧记…………… 李家白 (166)

刘佐龙被李品仙包围缴械经过…………… 黄少柏 (168)

“湖北省清党委员会”纪略…………… 李汉元 (170)

国民党“清党”中的点滴回忆…………… 单 栋 (17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记事诗…………… 魏子珍 (175)

忆李汉俊烈士…………… 傅光培 (181)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詹大悲…………… 胡邦宁 (186)

附录资料: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决议…………… (196)

国民政府委员就职及其通电…………… (197)

纪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198)

国民革命军实力之调查(节录)…………… (200)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声明…………… (203)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208)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湖北文史资料》征订启事…………… (214)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武汉

邓 初 民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种错误路线。正确估计了国共两党在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实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为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确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原则，并选举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组织形式。

当时我正在太原，当我看到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和许多具体办法后十分高兴。便向阎锡山提出要离开山西，回到南方去。恰好，1925年春，湖北省立法科大学聘我去当教务长。我没有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于1925年3月就回到武汉了。

我回到武汉的时候，董老（必武）已先在武汉建立并领导通过新的党纲党章而改组的国民党组织。我到武汉不久，董老就到法科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来找我，我便由董老介绍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那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约有20多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就我所知道的有：董老、吴德峰、蔡以忱、钱介磐、陈卫东、袁浦之、陈谭秋和他的夫人、李哲时（即李文宜）。此外，就是非共产党员，我记得的有：詹大悲、李汉俊、何羽道、孔庚、孙科。其中李汉俊、何羽道和我三人是常务委员。郭树勋是秘书长，吴德峰兼公安部长，李文宜任妇女部长。我任青年部长，后改任宣传部长等职。所进行的是地下工作。那时工会、农协、学生、妇女等组织也受其领导。这是我从事有组织领导的政治活动的开始。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强对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同时大会号召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这是响应孙中山先生1924年10月北上宣言的主张提出的。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得到共产党人李大钊等支持，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宣传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作用。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后，全国的农民运动也大大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共有九十万人，湖北农民协会就占有七万二千人。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军阀和反对贪官污吏等等的斗争。我也在组织的领导下，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北伐，在革命军队中进行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担任的。这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重大因素。那时北伐军有三个战场，一个是剿

南、湖北战场，吴佩孚的主力就在这里，这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北洋军阀陈嘉谟控制着这个战场的后方，对地下工作人员严加防备。在北伐军8月底攻占了湖北省境粤汉铁路上两个易守难攻的重要据点汀泗桥、贺胜桥以后，陈还死守武昌城区，捕杀了学生运动领袖陈完一。从8月底到10月中北伐军占领武昌之前，闭城约一个多月之久。被北洋军阀守城军捕杀和因饥饿而死者无数。9月，唐生智的部队何键所部首先到达汉阳。组织上立刻命我到汉阳去布置了一个欢迎会。10月11日，也就是北伐军攻占武昌的第二天，组织又命我到武昌去接收前湖北省议会为湖北省党部的办公地址。接着组织了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委员，我也是委员之一。随后改选了湖北省党部，我仍为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由1926年7月到年底，不到半年，国民革命军已占领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六个省份，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形成革命的高潮。由于北伐前夕工人、农民和学生都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工农群众的支援，成了北伐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都站起来了。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各地农民协会的会员和学生大量逮捕土豪劣绅，使得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在乡里不能立脚，逃往武汉。跑到武汉来的土豪劣绅，为各地学生所指认出来，一时在武汉被捕者达四五百人之多。湖北省党部建议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的机构，组织上命我担任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委员长。审判委员是由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组织的成员分别担任的，约有二十多名。我们根据土豪劣绅的罪行进行了审判，吴德峰判处了一个死刑，我判处了两个无期徒刑。在组织的领导下，不到半年我们就结束了这一工作。

一天晚上。陈谭秋同志特意到我家里和我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征求我入党的意见。当时由于形势的变化。我考虑到我入党

条件还不具备，同时考虑到我在党外为党工作比在党内为党工作更有利，我对陈谭秋同志说了我的想法之后，并表示我不管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陈谭秋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现在检查起来，我是实践了对陈谭秋同志的诺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仍持有这种看法，直到反右整风时我才觉悟到自己认识的片面性，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成立了省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到了武汉。特别是毛主席为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到了武汉。董老曾请毛主席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给全体人员讲过一次话。那时毛主席的形象同他在安源的照片一个样子。他站在省党部办公室讲话约两小时，声音很小，但听的很清楚，可惜讲话的内容想不起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还荣幸地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农讲所中任过课。

当蒋介石率领他的嫡系部队打到江西南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完成北伐，武汉政府组织了一个慰劳江西军民代表会，派我当团长，我率领武汉的农协、妇协、学生会、商会等代表五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就在旧督军署礼堂举行了接受慰问锦旗典礼，当晚他设宴招待代表团，蒋介石致欢迎词，我致答词，我痛切地阐明了武汉方面的意愿，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了不久，他们到武汉回访。开欢迎会时，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坐在蒋介石的左右。我和宛希俨分别代表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致欢迎词，他致答词。何香凝先生接着讲话，希望南昌方面能坚持国共合作，把北伐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讲完后痛哭流涕，非常激昂。可是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就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并到上海积极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策划“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惨案，背叛了革命，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

革命人民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在武汉政府内部，首先公开叛变的是夏斗寅，这是1927年5月13日的事，同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这就是有名的“马日事变”。武汉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更加明目张胆地和蒋介石勾结。6月29日，反动军官何键在武汉向他的军队发出反共训令。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举行所谓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和共产党决裂。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罪行，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5日以后，武汉国民党反动集团开始封闭工农组织，同时改组湖北省党部，把湖北省党部改称为改组委员会，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出走。我和李汉俊去找李富春同志请示怎么办。李富春同志指示说：你们能坚守多久就守多久。我便留在改组委员会，我的工作一直坚持到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之后。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叛变而失败了。从中我也受到多次深刻的教育，切身体会到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

1928年1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实行白色恐怖，我被迫在一个大风雨之夜，乘船离开了武汉，离开了这个我们开始走上新的道路的地方，到了上海。

我一到上海，便买了一份《申报》，看到登载：詹大悲、李汉俊被枪杀，李书城、孔庚已被捕，邓初民亦被捕的消息。反动派的残暴使中国革命一时转入了低潮，但唤醒了千百万工农，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锻炼了我们伟大的党，为我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吴伯就整理）

（武汉市博物馆国民政府旧址管理部供稿）

我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一段经历

侯 连 瀛

1925年8月，我由邓演达的关系到黄埔军校当教官，教筑城学，兼射击主任教官。到1926年第四期学员毕业时，校中以邓演达为首的左派同右派分子——孙文主义学会斗争颇为激烈，我当时是站在左派方面的，我有一支教学用的步枪，右派分子将枪偷去出卖后，反而用公文报告教育处向我要枪。从当时情况看，朋友们以为我继续当教官是不合适的，即将我调到二十一师。师长是严重。

1926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发表我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工兵团长。我奉命后，托严重代为辞职，严力加劝阻，并将黄埔军校第四期工科毕业学生全部分配给工兵团。学生天天围着我吃、要穿、要住，我也只得干下来了。实际上，这时蒋介石已到南昌，邓演达在武汉代行总司令职务，我当工兵团长，是邓演达委派的。邓当时是总司令职务部政治部主任，邓到武汉后，在广州方面，由政治部副主任孙炳文代行邓的职务。孙炳文催我迅速成立部队，我和朱勉方将工兵团成立起来。并由朱担任团附。我当时认为兵的素质不好，仅成立了团部直属特务连和通讯连，又成立了一个营，辖三连，由我的同学工兵中校（姓名回忆不起来）当营长。共有五个连，官兵约400人。

工兵团成立不久，蒋介石来电命我带工兵团到武汉训练。至于开拔经费，几经交涉，仅发给一半。我带部队于1927年元月初

由广州出发。元月下旬到达赣州时，张与仁师的政治部主任倪弼将赣州工会解散，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与倪弼间的斗争颇为激烈。工会闻我带部队到达，即向我说明倪弼解散工会经过。我密派谭伯夔等为工会帮忙。次日我去看张与仁和倪弼，闻倪已离赣州。师长张与仁先是倾向左派的，这时又转而倾向右派，但思想矛盾，颇感苦闷，曾举枪自杀未成。我去安慰他，他表示：觉得无面目见人，认为解散工会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在赣州住一周即出发。我离赣州后，倪弼又回赣州，假工兵团名义张贴反动标语，并拍照后扯去，想嫁祸于我。当时工兵团的营长是倾向右派的，连长倾向左派，排长中也有些倾向右派的。在行军途中，适届旧历年节，一些倾向右派思想的，都在暗中贪污弄钱，买酒肉过年，纪律很差。到南昌后，我去见蒋介石，我先问候“校长健康”，蒋询问途中情况后，最后说“如途中有困难，可驻在南昌训练”。我当时曾哼哼一声，辞去后即带队到车站，上车到九江，在九江拿钱买煤雇了三条船（当时雇船需雇主买煤）即出发，于1927年2月到达武汉。

这时，武汉市民正在欢度元宵节。部队到后，找不到住处，半月中数次迁移，天气寒冷，官兵无棉被棉衣，弥感痛苦。此时邓演达虽在武汉，但不管关于批发物资的事情。经再三请求始发下一小部分毯子和服装。后部队移驻豹头堤旧督军署，算是暂时安定下来。在开朝会时，士兵多说生活困难，经调查后，贪污军官多是倾向于右派的，当即分别予以处分。营长也感到干不下去了，即辞职到武汉军事政治分校当教官。我派茂亨团附兼第一营营长。接着在武汉成立两个营，共三个营，官兵约1500余人，枪械服装弹药等也逐渐补充起来。

当时武汉军事政治分校教育长原是张治中，他是忠于蒋介石的。他的亲信部下黄仲恂是左派，思想倾向邓演达。那时蒋介石曾密电张治中，命张以军校学生和能掌握的兵力，乘机控制武汉

政府。黄仲恂得此密电后，即密告邓演达。邓即一面用电话约张谈话，一面命令张发奎部队将张治中能控制的部队监视起来。张治中为形势所迫，遂离武汉去南昌。武汉国民政府将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把蒋介石的校长撤了，改为委员制，由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等五人为校务委员，委派我任教育长。校中的一些右派分子见我到校，就纷纷离开了。我和恽代英住在校内实际负责。军校学生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江腾蛟、第二团团长江文桂，官生共约3000余人。张在武汉时，曾成立一个学兵团，学兵系由俘虏中挑选而来的，张视为自己的中心力量。张走后，我即以该团团附黄仲恂升任团长。学兵团当时驻在武昌南湖训练，也归我指挥。在我任军校教育长前，曾奉命将工兵团改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由王茂亭以团附名义负责指挥，专门担任国民政府各机关警卫任务。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张治中离开后，左派力量日益壮大。校中左右派的斗争更为激烈，当时左派把右派的一些活动分子先后关起来。在打夏斗寅时，右派分子刘魁等乘机煽动，并偷去枪支，我即将刘魁等数人枪毙。我任军校教育长后，邓演达即密告我说：“现在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你不要把军事政治学校仅仅当成一个学校来看，一切要作好战斗准备。”我当时和恽代英在校中即按照作好战斗准备的要求去做的。军校军需处长先为刘惠凡，此人反对战争，也不愿作战斗准备工作，学校每月经费50万元，常常用不完，还要交上去。叫他作好各种军事物资准备，他也不去完成。后改派王伯苍（共产党员）为军需处长，我告王即行作好各种军事物资准备工作，恽代英积极向官兵灌输军事动员思想，为保卫武汉作了军事准备。

蒋先云（共产党员）原系蒋介石的亲信部下，“四·一二”后，见蒋介石背叛革命，即决定脱离蒋介石由南昌来武汉，由国民政府拨给一团新兵，蒋向我要干部。我允许他由中央军事学校

约请干部，他当面加委，即迅速成立一个团，蒋先云任团长。部队成立三天，即开往河南临颍一带作战，蒋先云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阵亡，该团官兵派人将他棺材于5月15日运回武汉放在军校礼堂。5月16日开追悼会，全校官生均参加。

在开蒋先云的追悼会时，接中央军委电话，命我和叶挺同到汉口军委会去谈话。我到军委会时，叶挺也赶到，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赶到，谭延闿命我们三人研究布置兵力于鄂西，防备杨森部队之进攻。因此蒋介石已暗中勾结杨森和夏斗寅两部进袭武汉，企图摧毁武汉政治中心，从而消灭左派势力。我和叶挺、加伦正在研究时，听说由咸宁城来人，要见谭延闿。谭接见时，来说：“夏斗寅部队已在咸宁城内捕杀共产党员，并扬言要进攻武汉。”谭接见后，对我们说：“只有准备干吧！”接着即令汉阳兵工厂，速发40万子弹，补给军校学生，并令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官生，改编为中央独立第一师，委派我任师长，恽代英为党代表。并限令叶挺所带的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一师于18日晚出发。当时叶挺还担任武昌警备司令。

我回到武昌军校后，与恽代英共同着手编制部队。军校官生仍按两团编制，第一、二两团团长沙仍为蓝腾蛟、史文桂，又将武汉农民讲习所编为第三团。17日晚，我到叶挺的司令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当时叶已出发侦察地形，叶用电话对我说：

“你留在武昌，负责武昌警备司令部事宜，我到前方指挥作战”。叶当日率队乘火车出发到纸坊，我即火速请领子弹，17日未领到，18日早子弹已装箱装船，但是迟迟不放行。到下午5时，我即令官兵吃饭。饭后，军需处长报告说：“船才开到文昌门”，我即亲率两团官兵到文昌门上船，命官兵各自用刺刀劈开子弹箱，自行将子弹带装满，向连长报数目。装完时已近薄暮，官兵唱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雄壮的歌声，第一团向纸坊出发，第二团回校部作预备队，第三团除担任各机关警卫外，

抽调一个营开赴金口防御，我和恽代英曾同赴金口向官兵讲话。黄仲恺带领之学兵团，就在南湖驻地准备，未予调动。

叶挺师和独立第一师第一团赶到纸坊连夜部署就绪，19日早即和夏斗寅部遭遇，激战2小时，至9日许即将敌军打垮。叶来电话说：“已将夏部打垮，俘虏敌官兵甚多。”在俘虏的绑腿中多数有不少钞票。当时夏斗寅以为武汉部队均出发到河南参加北伐作战，武汉空虚，占领武汉可轻而易举，对官兵说，到武汉可以发财，因此敌官兵思想中均无作战准备。故一经我军猛烈攻击，敌军即行溃败。叶挺率军当天追击到土地堂，20日即占领咸宁。夏斗寅残部退到通山后，进入江西境的幕阜山中。

打垮夏斗寅部队的进击后，奉军委会命令，由副师长杨森带独立第一师指挥部第一团出发到新堤，第二团接着也到新堤，第三团调驻武汉校部。程潜之第六军亦由九江赶到新堤、天门一带。我师由新堤向前挺进，即与杨森部接触，杨部官兵多吸食鸦片，战斗力甚差，一经接触，即行溃退，俘虏敌人很多，打退杨森部队后，独立一师于6月底开回武昌。官兵乘汉航号轮船于夜间回到金口时，带队官兵忘记口令，驻金口之警卫团即行开枪，汉航号轮船在仓促中撞到金口前面山脚下，船撞毁而沉，淹死官兵百余人。部队开回武昌后，暗中敌人造谣，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尤其是军事政治学校共产党员更多。为了防备暗中敌人的突然袭击，第一、二两团到武昌后，即在南湖东南地区野营。当时程潜曾召集独立第一师官兵讲话，指出于打败夏斗寅和杨森两次战役后，官兵有骄奢淫逸现象，需要加强整理。不久，奉军委会令将独立第一师名义取消，仍恢复学校建制。但一、二两团仍野营郊区，仅女生队200余人驻在校内。

邓演达在打垮夏斗寅部进攻后，即赴苏联。他在5月间在武昌医院养病时，曾叫我以他名义给严重写信，派俞何兴送往杭州（当时严重在杭州）。信中大意是说明武汉内部团结，催其速来

武汉。严接信后，表示不来。邓在离武汉前给我写信交邹秘书亲交给我，嘱我在政治上听郭沫若、在军事上听张发奎的话。我接信后，未找到郭。到6月10日前后，唐生智部队由河南开回武汉，即公开搜捕共产党人。到7月15日孙科召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官生讲话，并通知在集合讲话时学生不准带枪。在会上孙科装腔作势的说：“我们不向左走，也不向右走，遵照着总理（指孙中山）指出的中间大道一直往前走。”会后，恽代英对我说：“孙科的话，说的真巧，但中国青年是不能没有出路的，我现在就要去给中国青年找出路”。

会后不久，军委会即下令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教导团，由杨澍松任团长，归张发奎指挥。我将校中第六期学生毕业手续办理完后，将其余未能毕业的一律编入教导团。闻张发奎部于1927年7月下旬由武汉出发先到九江、南昌，后到广州，教导团出发到九江时，杨澍松即离开部队，教导团到广州后，参加了广州暴动。黄仲恂带的学兵团，也算毕业了，各发给路费离去。我被调为张发奎总部参议。关于警卫团，我与恽代英商议交给卢德铭（共产党员）率领，卢任团长。他率官兵准备赶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出发时，团部存现洋，因行军携带不便，卢令将现洋若干箱，当众投入江中。后闻卢德铭率全团官兵赶到湘赣边区参加红军。

恽代英离开武汉前，劝我到张发奎部报到，并留下他到九江的通讯地址，叫我到九江去找他。我到张发奎部报到，见张后，出示邓演达给我的信，张看过信后说：“自己人，自己人。”张也拿出邓给他的信，我看信长有十几页，但张未叫我看信的内容，我当时颇不愉快。我见张后，即到九江，去找恽代英。到九江闻恽代英已到庐山，我赶往庐山，闻恽已他去。遇苏联顾问对我说：“南昌起义成功，我们应当高兴。”但我当时希望国共合作，对南昌起义并不感到高兴。在庐山见报载张发奎枪决范盖